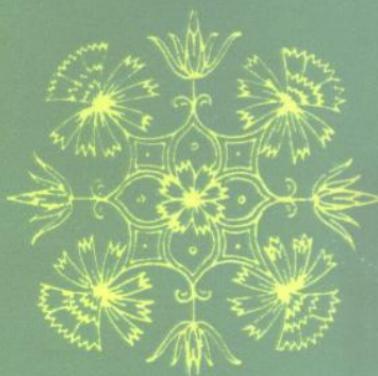


《资本论》与经济体制改革

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编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资本论》与经济体制改革

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编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潘令宇

责任编辑：谢乐如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光华村)

成都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工业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63 字数181 千字

1987年3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4000

书号：4479·8

定价：1.40元

序 文

献给读者的，是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的论文选集。

眼下的中国对论文集的议论，是众说纷纷，但有识之士认为：要是真想读书，倒是论文集好。何以见得呢？他们列举了若干条。第一条是集一个时期各位作者或一位作者各个时期之精华，因此它的质量往往相对地高；第二条是不论按问题或者按作者都比较专门和相当集中，因而往往引起读者的兴趣；第三条是能及时反映研究的成果，使文章的观点新颖，所以“适销对路”；第四条是起到理论信息交流的作用，从而使未能参加学术会议的同志也能分享学术会议的果实；第五条是真正体现了“双百方针”（当指学术会议论文集）；……。在国外，每开一个学术会议，必出一本论文集。这大概是这些理由的体现吧！鉴于眼下论文集在中国的厄运，不得不在这本论文集的序文中首先说了这许多。但愿不会被认为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所说的瓜话吧！

至于这本论文集的命运，最好让读者去评判。

编者有权和有责说的话，是这本论文集是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的集萃。读者从中可以发现，它的主题是《资本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书就是围绕这个主题选编的。换句话说，它一方面是成立于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的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体汇报，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是无主题的论文汇编。

这个主题表明了什么？表明了四川省《资本论》研究会从它诞生伊始，就一直遵循这样一条根本原则：用《资本论》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条根本原则，可以称做既坚持《资本论》又发展《资本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要遵循这条根本原则，就必须排除两种干扰——“过时论”与“停滞论”。

“过时论”早在《资本论》刚刚传进中国的时候就有了，时至今日依然存在不足为奇。最早的“过时论”是以“不适合（中国国情）论”出现的，说是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抨击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不适合于中国，这番“不适合论”由罗素和杜威跑来中国鼓吹和中国几个反动文人应噪曾经甚嚣一阵，以李大钊、周恩来、李达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同这种“不适用论”作了对阵，经过几个回合，“不适用论”就败阵下来。尔后的“过时论”是以污蔑性的“马尾巴功能论”出现的，这就是所谓的《资本论》讲的是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不适用于“帝国主义全面崩溃、共产主义全面高涨的新时代”的论调，不过这种“马尾巴功能论”也是短命的，随着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也就破灭了。今天的“过时论”，是某些幼稚的不知《资本论》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为何物的所谓“第四代学者”散发的，在自诩为“第四代学者”看来，《资本论》不灵了，不能用来振兴中国，应当用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代”之，所以今天的“过时论”不如称之为“取代论”更为贴切。纵观三个阶段的“过时论”，虽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是都在于说《资本论》“过时了”。殊不知《资本论》集马克思主义之大成，这就无异于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6/26/91/06

“停滞论”，也是不对的。持“停滞论”者，似乎也在反对“过时论”，坚持、捍卫《资本论》，然而却拒绝承认《资本论》问世以来已经得到的长足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被称为是《资本论》的续篇，难道不是对《资本论》的创造性发展吗？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创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论，难道不是《资本论》在中国传播的产物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难道不是《资本论》的创造性发展吗？如果把《资本论》当作《圣经》里的教条，或者当作对号入座的座签，而不是当作行动的指南，就难免会陷入“停滞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此“停滞论”不过是“教条论”的翻版。正因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论”或产品经济的“教条论”，所以无力同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教条论”对阵，纵然把新教条的对方压服，也不能把他们说服。

我们的观点是一一虽然每位作者的某些看法有分歧，但是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大同小异——对《资本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坚持才能发展，反过来说，只有发展才能坚持。这里的坚持，主要是坚持《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无政府的商品经济理论；这里的发展，主要是奠定了“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的由《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

收进本论文集的所有论文，尽管论述的着重点有所不同，但是都向读者表明了：《资本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得到发展。本会的创始人之一，四川省经济学会会长林凌研究

员写了题为《以〈资本论〉为指南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问题》的专稿，本会会长刘诗白教授和副会长鲁济典副教授、姜凌副教授、顾宗枨副研究员的四篇论文，一个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微观结构的多元性，一个从社会主义所有制宏观结构的多元性，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必然性，一个从社会主义劳动力的商品性，一个从计划决策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机制。至于长期被忽视，今天又迫切需要的对资金商品、信用制度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阐述，在本论文集中所占篇幅最多；人们最为关注的价格体制改革和工资体制改革的论文，不仅选进了，而且选进了不同观点；两篇关于固定资产使用、折旧和更新的文章，也颇具特色。正因为所有论文都围绕着主题写作，所以使本论文集，第一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结合性，第二具有显著的新颖性和创造性。这两点，将使读者感到有兴趣。

它的第三个特点，是本会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取得的成果的表现。这就是合作性。本会一成立，就接连举办了两期为数 160 人的为期一年的《资本论》讲习班。有些作者，既是学员又是会员。因此，可以说，师生“同台演出”使这本论文集相得益彰。本会组织编写的《〈资本论〉难句解》（三集），已经开了师生“同台演出”的先例。

本书由本会秘书长（按姓氏笔划为序）林圃、杨克强、海宇东、游联璞四位副教授负责选编。应当特别提到，本会理事、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谢乐如副教授为本书的出版花了心血。

现在结集出版了，敬请读者予以品评和指正。

编 者 1986年10月1日

目 次

序 文.....	(1)
以《资本论》为指南，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 的新问题.....	林 凌 (1)
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两权分离模式.....	刘诗白 (11)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所有制结构改革...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改革及其在经济体制改	姜 凌 (38)
革中的决定性作用.....	游联璞 (57)
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商品性.....	鲁济典 (69)
论国家同企业的投资关系与资金商品问题... 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资金市场	林 圜 (79)
——学习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理论的一 点体会.....	傅昌宏 (99)
《资本论》中的股份经济理论与我国社会主 义股份经济.....	纪尽善 (113)
银行实行复息制度初探.....	陈泰超 刘育俊 (122)

- 试论利率的间接控制作用 曾绍熙 (137)
- 学习《资本论》中设备更新理论，指导我国
企业的技术改造 海宇东 (145)
- 机械工业固定资产的使用和更新
——学习《资本论》关于固定资本理论
的一点体会 聂昌勋 (157)
- 计划决策如何利用市场机制——经济运行机
制的一个核心问题 顾宗枨 (174)
- 应当全面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 邓佑忠 (192)
- 价值规律与计划规律关系新探 王晓峰 (202)
- 价格结构与纯收入率 周 春 (214)
- 从横向经济联合进一步看平均利润、生产价
格的形成 刘海峰 (228)
- 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生
产价格的形成 刘华富 (233)
- 试论以价格调节供求 刘开海 (239)
- 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探
讨 余 还 (253)
- 预先计划好周转快和周转慢的部门、企业之
间的比例关系 艾世伦 (263)

以《资本论》为指南，研究经济 体制改革中的新问题

·林凌·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现在已经近8年的时间了。8年的改革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这6年为第一阶段，是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探索阶段，为改革作了实践和理论的准备；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为第二阶段，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和深入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已进行了两年。按照“七五”计划作出的改革要求，这个阶段还要延续到1990年或再长一点时间，也就是还要再进行4年多，大体上也是6年时间。目标是奠定新体制的基础，或者说搭起新体制的框架。从探索到新体制框架的形成，大体上要12年时间，框架建立起来之后，并不等于改革的结束，继续改革的任务还很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未来的4年中，改革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要以《资本论》为指南，去研究这一系列新课题。

一 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框架结构的选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最终要改成什么样子？这是进一步深入改革必须明

确的一个重大问题。前一段时间，我们常讲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针对步骤和方针来讲的。因为改革很复杂，我们又缺乏经验，因而必须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一步一步的摸索前进。但如果认为是指改革的目标，那就不对了。改革和过河一样，目标必须在事先确定。如果下到河里了才去摸着石头找目标，那是危险的，至少是一种盲目性。如果把经济体制改成一个什么样子都不明确，而是改一步看一步，那肯定会把改革搞乱。要确定一个目标模式，首先涉及一个确立目标模式所依据的前提和标准问题，即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类型的目标模式。就世界范围来看，比较系统的理论模式有这样几种：

第一、按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划分；有：①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模式（苏联建国初期）；②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苏联斯大林领导时期）；③改良的计划经济模式（苏联勃列日涅夫领导时期）；④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的苏联和匈牙利）；⑤市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根据这样的标准划分，我国以前主要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同时还有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模式的色彩。改革的方向是朝着建立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

第二、以经济决策层次为依据来划分，即按照国家、企业和个人这三个决策层次的不同情况来划分，有：①宏观管理决策是集中的，第二层次也是集中的，第三层次则是分散的（苏联）；②宏观管理决策是集中的，企业在国家指导下自行决策，第三层次是分散的（匈牙利）；③国家、企业和个人这三个层次都是分散的（南斯拉夫）；④三个层次都是集中的（中国）。

第三、以经济协调机制为标准来划分，有两大类，即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行政协调又有直接的行政协调和间接的行政协调，市场协调又有无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

包括资本主义在内，世界上没有不存在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但这几种划分都没有把所有制问题提出来，因而容易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根据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归结起来有这样三种：①否定或限制商品经济发展；②能够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③企图取消宏观控制模式（南斯拉夫）。

关于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承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不那么确定的。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肯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就非常明确了。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我国的限制和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旧体制。改成一个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新体制。

目标模式确定之后，构成这种经济体制模式之框架结构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另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中还没有讲具体，党的代表会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才把它明确提出来。所谓构成新体制框架结构的基本要素，实际上就是“七五”期间改革的三项任务。

第一个基本要素，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直接承担者，以全民和集体企业为主体的，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各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我国，由于存在以公有制为

主体的多样化的所有制结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但所有制不同，发展程度也不同。在我国边远地区，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不少农村家庭承包经济还是为买而卖的小商品经济，城镇个体经济也属于这类；私人雇工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中外合资企业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成分，也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成分；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联合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把我国新体制的框架结构建立起来，首先就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使其他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商品经济都各得其所，共同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在上述各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中，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没有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不真正具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内在机制，这是急需加以改革的。

第二个基本要素，就是为各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事经济活动所提供的场所和舞台，即我们常说的市场体系。

为了使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活动卓有成效，必须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这种体系和机制必须是完备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是统一的而不是分割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是竞争的而不是垄断的。支配它的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资金供求规律等，使各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有充分的用武之地。现在这种市场体系正在建立之中。当前特别重要的是建立商品市场，尤其是生产资料市场和资金市场。这两方面是市场体系的基础，把它建立起来了，各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基本上有了施展其才能的活动舞台，其他市场的建立也就好办

了。

第三个基本因素，就是国家为各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原则进行商品经济活动所制定的宏观控制和调节手段。我们的商品经济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有计划地进行宏观控制和调节的商品经济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种宏观控制和调节，一是为各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制定的与其性质、地位、特点相适应的行为规范，或叫活动准则，如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条例、对城乡个体经济的管理条例和政策、对私人企业的雇工数额和经营范围规定，都属于这一类。二是国家为整个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计划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调控手段。这两方面构成了我国新体制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即国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活动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管理。

上述三个要素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举办体育运动会的三个基本要素作比喻。各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如同各类运动员；市场体系如同为各类运动员进行各种体育项目比赛提供的运动场所；国家为各类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制定的行为规范和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制定的调控手段如同为各种体育运动制定的比赛规则。对于体育运动来说，如果有了各类优秀的运动员，有了完备的运动场所和设施，有了科学而严格的比赛规则，就能举办出一个既有激烈的竞争，又有良好的体育道德的高水平的运动会来。同样，我们的新体制如果具备了以上三个基本要素，就能使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运动得到健康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

二 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实现两种体制 模式的转换

经济体制改革怎样进行，可供选择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揽子方式，即国家制订一个改革的总体方案，同时在全国各地各部门统一实施；一种是渐进方式，即改革从局部试点开始，逐步向全局推进。国外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多持前一种主张，我们则采取后一种方式。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不能一刀切，齐步走；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没有先例，从理论到模式都要摸索；而且任何改革措施都有利有弊，需要对比选择；最后，改革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安定团结，步骤必须稳妥。但是采取这种方式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要出现一个新旧体制并存的过渡时期。因为改革是渐进的，开始的时候，必然是旧体制占主导地位，以后新体制的因素不断增加，两种体制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改革成果的积累，改革进程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新体制才能确立起来，因此两种体制并存就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两种体制的运行机制是大不相同的，在旧体制下，整个经济在直接的行政系统指挥下按照指令性计划纵向运行；新体制则要求国民经济在有计划的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横向运行。因此，在新旧体制并存时期，经济生活必然要经常发生种种矛盾和磨擦，如两种价格体系的矛盾；两种运行机制的矛盾；所有制改革的矛盾。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上经常进行调整。7年多来，改革中发生的种种矛盾，主要根源就在这里。

现在我国正处在两种经济体制，两种运行机制并存的阶段。但是两种体制谁强谁弱，还是势均力敌，看法不尽相同。要作出科学的判断，必须对农村和城市的改革形势作具体分析。

从农村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实现了农村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在集体经济中注入了家庭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因素。这种农村微观经济模式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建立起极为密切的联系，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农民当中扎下根，再不可逆转了。因此可以说，在两种体制转换中，新体制已在农村占居主导地位。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要复杂得多，尽管我们已经取得许多突破性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脱离旧体制的框框，企业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行政机构附属物和“吃大锅饭”的地位，与职工利益还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因此，虽然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而一旦经济生活发生矛盾，旧体制就会轻而易举地把这些权力收回去，企业也无力抗衡。1985年我国经济生活曾出现追求高速度而导致的社会总需求膨胀。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家自上而下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问题解决了，但改革也因而受到影响。甚至发生倒退现象。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我们惯用的旧体制手段，与改革的方向是相反的。从这里我们看到，在城市，新体制不但没有占居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形成与旧体制抗衡的力量，在改革中部分地走回头路不是不可能的。

根据以上分析，对改革的成就，特别是城市改革的成

就，既要有充分的估计，又不能估计过高。现在我们应当努力的是：巩固和发展农村改革的成果，更有力地推进城市改革，缩短两种体制并存的时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新体制在城乡都能居于主导地位的宏伟目标。

三 实现改革目标模式的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认为，由于新旧两种思路并存，旧体制的机能局部失效，新体制的机能又不能一下子形成，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使经济生活中的磨擦和矛盾激化，漏洞很多。前几年，我们在增强企业活力方面作了比较大的努力，但在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这两方面的改革进展较慢。这样，企业也就谈不上能真正搞活。为此，当前的改革要从建立市场体系和实现以间接控制为主两方面入手，而且步子要迈大一点，这样新体制才能有效运行，企业才能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在大体平等的条件下开展竞争。与建立市场体系和实现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管理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是价格、税收、财政、投资四个方面，因此，这四个方面的配套改革应成为当前改革的重点。其中带头的是生产资料，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的价格调整和统一的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因此，四个方面的改革主要从调整生产资料价格起步。

另一种思路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扩大企业自主权选择为城市经济体改革的突破口，把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企业的活力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把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改革至今，